

今年正值复旦中文系百年庆典,我从复旦中文系毕业也已整整五十年了,半个世纪的岁月将往事冲刷,只剩下一些记忆的碎片。回顾当年在中文系就读的日子,对我影响最大,印象最深刻的是朱东润、赵景深和章培恒三位老师。

1962年,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,那一年15岁。刚进大学不久,系主任朱东润就在家中召见我,由班主任秦家琪老师陪同前往。朱先生不苟言笑,不怒自威的神情让学生都有些怕他,我这个新生见了他更是忐忑不安。朱先生见了,随便问了些我的个人情况,然后说:“很多年没有招到你这么年纪小的学生了。学文科,年纪小先天不足,缺乏社会阅历,对很多事情不容易理解。我曾考虑今年不录取你,又怕你今年考不上,明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,最后是我与杨西光拍板,将你招进来的。”接着朱先生谈起明代张居正的故事。张居正十二岁考中秀才,有“少年秀才”之称。次年参加乡试,主考是湖广巡抚顾璘。顾璘见他年少,没有录取他,张居正为此愤愤不平。三年后,张居正再次参加乡试,顾璘录取了他,并亲自召见,赠送他一条玉带,张居正才体会到顾璘的苦心。朱先生接着问我家里经济条件怎样,我说还可以,朱先生说,如果经济条件许可,毕业了不要急着找工作,应该考研究生。朱先生的这句话我铭记在心,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制度,我便报考复旦中文系的研究生,从此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。

朱先生与我谈话完毕,便与秦老师谈起系里的事情,因与我无关,说些什么记不得了。尚有印象的是朱先生主张中文系的老师要学外语,他说自己阅读英文书,每小时能看60页,与读中文书的速度差不多了。

毕业十年后,重新回到复旦读研究生,朱先生给我们上过课,还曾到他家参加过学术讨论,他的身板还是那么硬朗,说话声音还是那么宏亮,好像十年磨难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丝毫痕迹。后来我在复旦古籍所工作,与朱东润的孙女朱邦薇同一单位。那时我住第二宿舍,与第一宿舍对门,经常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去朱先生家玩。朱先生很喜欢小孩,孩子见到他也不害怕,缠着老爷爷要他写字。那时朱先生年近九十,在门上贴了张纸条,谢绝来客索字。朱先生为我破例,写了一张韩翃《寒食》条幅,还特地装裱好送给我。朱先生在聊天时,说起我们的职业是教师,因此要教好书,对得起这个饭碗。搞研究是自己的事情,要坚持不懈,如果每天写两千字,日积月累,也就很可观了。他还主动提出,愿意为我的著作写序,真是给足了面子。遗憾的是,我第一本著作《晚明文学新探》问世时,朱先生已驾鹤西去。

朱先生是传统文人,颇具儒家的家国情怀,他以撰写传记文学著称,选择的传主,如张居正、陆游、陈子龙、元好问,都是具有政治影响的人物。他的传记文学,以历史为借鉴,或弘扬民族正气,或宣扬儒家精神,或指示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,都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。正因为如此,他对陈寅恪的《柳如是别传》表示不满。1981年5月,中文系在资料室召开第一届硕士生毕业典礼,朱先生在会上说:“有人说我的学生记性很好,但记性好不一定能做好学问。陈寅恪的记性够好,他的《柳如是别传》引用大量资料,我想把他引用的资料编成索引,也没有编成。但是花那么大精力,用上百万字为一个妓女作传,有什么意思呢?”陈寅恪的关门弟子蒋天枢先生听了这番话,坐不住了,他并未直接反驳朱先生

难忘恩师：朱东润、赵景深、章培恒

写在复旦中文系百年庆典之际

马美信



■复旦大学中文系曾经的办公楼

【作者简介】

马美信 1962年考入复旦中文系,1968年毕业分配至新疆,先后在奇台县宣传部、新疆人民出版社任职。1978年考取复旦中文系研究生,师从赵景深、章培恒先生攻读元明清文学,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,留校在古籍所工作,1998年调入复旦中文系,任副教授、教授。著有《晚明文学新探》、《宋元戏曲史笺证》、《脂评本红楼梦校注》等多部专著,发表论文数十篇。

的倾向,却是很实际的想法。坚持原则而能变通,是做人的一种境界。

一

大一下学期,章培恒老师给我们上第一段文学史。那时章先生还不到三十岁,瘦骨伶仃,容颜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。章先生上课时,低头看着讲台,好像在照本宣科,实际上他从不按照教科书授课,也不用备课笔记,讲课的内容以及引用的资料,全装在脑子里,可见他记忆力超人。章先生讲课条理清楚,逻辑性很强,并时有新见,将他讲课内容记录下来,就是一篇现成的论文。二年级时,章先生组织刘明今、徐祝庆和我写一篇关于屈原的论文,由一个人写初稿,章先生提出修改意见,另一个人写第二稿,如此反复,三人各写一稿,最后由章先生定稿。文章投送《光明日报》,清样出来了,不知什么原因,最终没有发表。章先生又让我和徐祝庆写一篇评论南戏《荆钗记》的文章,1964年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。该文针对赵景深《荆钗记的人民性》而发,强调《荆钗记》宣扬封建意识,并无进步性可言。为讨论修改文章,我几次去了章先生在凤阳路的住所。那是一幢老式房子,章先生住后厢房,房间不大,光线很暗。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,没有什么家具,一个装二十四史的红木书柜占据了房间一半面积。这套二十四史是蒋天枢先生送给他的。章先生曾为蒋先生校阅书稿,蒋先生要将稿费分一部分给他,章先生认为弟子为老师做事是应该的,不肯收取报酬,于是蒋先生花二百多元买了一套二十四史送给他。

大学本科毕业,我分配到新疆工作,与章先生保持着通讯联系。我利用业余时间读点中国古代史和古典文学,经常写信向章先生请教一些学术问题。有一次,我写信说正在看陈寅恪编的《魏晋南北朝文学资料》,将陈寅恪误写为陈寅恪,章先生回信说陈寅恪不会编这样的书,并建议我读陈寅恪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和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。1978年,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,我便报考了赵景深和章培恒联合招生的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。

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,赵先生负责小说、戏曲,章先生负责元明清诗文。章先生让我通读明清文集,他则重点讲解李贽和龚自珍的诗文,有时候为搞清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的意思,要琢磨推敲老半天。章先生严谨的学风,使我受益匪浅。

章先生除了授课,还指导我写论文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古代白话小说选》,请章先生写序言,章先

生让我写初稿,经他修改后联名发表。《三国志通俗演义序》,也是我和章先生合作的成果。序言前半部分论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点,重点放在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与通行的毛本《三国演义》的比较,是由我起草,经章先生修改。后半部分考证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成书年代,则由章先生执笔而成。我还在章先生的指导下,写了《论龚自珍的启蒙思想》、《龚自珍佚札辨伪》等文章。通过撰写文章,提高了我的学术水平和写作能力,尤其是《辨伪》一文,章先生为我指示了考证的门径。

1982年,硕士毕业,接着报考赵景深先生的博士研究生。因为我的硕士论文是《晚明文学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比较》,博士论文就在此基础上扩展为《晚明文学研究》。虽然章先生不再给我上课,我依然经常向他求教与论文有关的问题,并去旁听他给本科生开设的《明代文学》课。章先生一如既往地悉心指导我的论文,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。

章先生本是中文系主任,在任期间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其中反响最大的是辞退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。当时辞退三个教师的公函是章先生让我分别送到他们宿舍门房的。章先生锐意改革,使原有的矛盾更加激化,他提出的举措难以施行,于是辞去系主任的职务,创建了复旦古籍整理研究所。章先生吸取在中文系当系主任的经验教训,聘用的教师和研究员都是年轻人,且绝大多数是他的学生,于是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,就被留了下来。

起初,章先生采用家族式管理方法,他像家长一样关怀着每一个教师和工作人员,经常和年轻人一起吃饭喝酒,藉此联络感情,让大家齐心协力做好所里的工作。有一次,由章先生发起,在贾植芳先生家里举办十大名酒品鉴会,章先生拿出珍藏多年的好酒,凑足了茅台、五粮液、泸州老窖、汾酒等十大名酒,参加酒会的除了古籍所一批年轻人,还有贾植芳的学生陈思和、复旦分校的彭飞,总共十二三人。一个晚上,将十瓶酒全喝完,此后古籍所的气氛很融洽,但工作开展并不顺利。复旦古籍所承担《全明诗》的编纂工作,前期的准备工作是调查全国所藏明代诗文集的数量和版本,查阅明代碑文,每个传主做一张卡片,内容包括姓名、籍贯、出生年月、简单的履历。这两件事情,工程十分浩大,且每天做卡片简单枯燥,很多人觉得这样机械性的工作对提高自己学术水平帮助不大,时间久了便产生厌烦情绪,工作效率也就不高。章先生觉得做事情光打感情牌不行,还是要有严格的制度和纪律。于是制定了工作量考核制度,规定每人每天要完成多少张卡片。他先自己做卡片,计算每小时能做多少张,然后按照每天八小时确定工作量。由于各种原因,《全明诗》的编纂工作进展缓慢,我1985年进所,到1996年调到中文系任教,《全明诗》只出了三册,最后不了了之。

章先生晚年做了两件大事,一是主持编纂《全明诗》,结果半途而废,成了章先生最大的遗憾,另一件事是重写文学史,则取得很大成功。章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以人性的发展为贯串线索,揭示文学的意义在表现人性的深度,人性的发展决定了文学演进的走向,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。

章先生为人讲原则,重情义,尤其注重培养和提携年轻人。巴蜀书社编一套《古代名著选译丛书》,章先生是主编,我承担《庄子选译》。由于出版社催稿很急,章先生夜以继日地审阅此书稿,并不因为时间紧

迫而稍有马虎,每句每字都要精心推敲,对书稿作了大量的修订。三天后我取回稿件,看着章先生留在书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,心中的感动难以言表。章先生对他的每一个学生,都是这样尽心尽力的。

三

在我的印象里,朱先生刚正,章先生严谨,赵先生则宽厚。

我是赵景深先生在“文革”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,也是他唯一的博士生。在三位先生中,我与赵先生相处最晚,认识却最早。1961年,我在长江中学读高二,学校请赵先生作演讲。赵先生在演讲中提到鲁迅做学问如何认真,他在翻译果戈里的《死魂灵》时,其中提到一座希腊雕像,鲁迅为了搞清这座雕像的名称和来历,查阅了许多资料。在赵先生的言谈中,充满了对鲁迅的崇敬。

1978年,我成了赵先生的硕士研究生。第一次去赵先生家,我满怀歉意地提起当年写过一篇论《荆钗记》的文章,是与先生唱反调的,赵先生大度地说:“学术上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,希望将来学生能超过老师。”我在章先生指导下撰文批评赵先生,结果赵先生和章先生都成了我的导师,这是巧事,也算是缘分吧。

赵先生做学问,有实事求是之心,无哗众取宠之意。他给我开设中国戏曲史课程,将数十年研究戏曲的心得重新梳理了一遍,打算藉此写一部《中国戏曲史》。凭赵先生的学识和声望,出一本戏曲史并非难事,但他考虑再三,觉得他对戏曲史的认识,虽然在不少地方有所发明,但没有系统性的突破,于是放弃了原来的计划。

与赵先生接触过的人,无不为他宽宏大度、谦逊质朴、助人为乐的人格魅力所折服。叶德均是赵先生早期的学生,在小说、戏曲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皆有成就,因为历史问题被发配到僻远的云南大学任教,1956年自杀身亡。叶德均去世后,赵景深、李平整理他的著作,结集为《戏曲小说从考》,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。此书的出版,不知怎么得罪了一位研究戏曲史颇有成就的学者。此人是赵先生老友,患难时曾得到赵先生的帮助。有一天,赵先生突然收到他写的一篇文章,痛斥赵先生为自绝于人民的汉奸文人整理出版著作,是何居心,并在文章空白处写上“杀人者,打虎武松也”几个大字,大有气势汹汹打上门来的架势。我们几个学生见此如此嚣张,表示要写文章回击。赵先生劝阻我们,说随他去罢,不要扩大事态了。

1984年,我完成了博士论文《晚明文学研究》,赵先生认真地逐字逐句审阅了我的论文。1985年初,赵先生从楼梯上摔了一跤,引起脑溢血,半夜昏迷不醒,送进医院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从赵先生的日记得知,先生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,就是审阅我的论文。

上述三位老师,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。朱先生为我指明努力的方向,章先生领我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,赵先生教我如何做人。三位老师有说不尽的话题,这篇短文,不是为三位先生作传,也无意对他们的生平学术成就作全面的介绍,只是记叙我亲身经历的一些琐事,以纪念三位老师,纪念我从复旦中文系本科毕业五十周年。

